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温州试验:两个人的改革开放史/吴逢旭,陈文苞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9
ISBN 978-7-213-03830-3

Ⅰ.温… Ⅱ.①吴…②陈… Ⅲ.乡镇经济-经济发展-研究-温州市 Ⅳ.F299.27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20692号

书　　名	温州试验——两个人的改革开放史
作　　者	吴逢旭　陈文苞　著
策　　划	柯　熙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洪　晓
封面设计	顾　页
电脑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大众美术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6.4万
插　　页	1
版　　次	200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3-03830-3
定　　价	3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CONTENTS

目录

为什么是温州？——《温州试验》序言 / 1

上篇 陈定模传奇——龙港走向城市化

陈定模到任苍南县龙港镇镇委书记后，开始在龙港这块很小的地盘上，进行土地、户籍等改革，每一项改革都是向当时的政策发出挑战。

陈定模设计的城市日后被命名为“农民城”。

而陈定模在政坛上都是孤独的。

他被人誉为“孤胆英雄”，以至于农民城造好后，他只能黯然神伤地离开了龙港。

一直到1998年9月，他高票当选为“温州改革开放风云人物”之后，人们才又一次想起了他。他的那些传奇故事吸引着我们，也感动着我们。

第一章 蓄势待发 / 3

第二章 龙港！龙港！ / 32

第三章 闯关 / 53

第四章 孤胆英雄 / 71

第五章 调查组 / 93

第六章 放虎归山 / 105

第七章 布道十年 / 115

第八章 从村民到市民 / 124

中篇　屠挽生记忆——柳市迈向工业化

20世纪80年代，他见证了乐清农民走上工业化道路的艰难历程，亲历了“温州模式”试验区的各项改革试验。

他就是原乐清县柳市区区长屠挽生。

20多年过去了，当年风起云涌的改革试验，他还历历在目。

现在，他要讲述的是中国电器之都崛起的奥秘。

第一章　柳市崛起的“三大法宝”　/ 143
第二章　开路先锋　/ 163
第三章　供销员白手打天下　/ 177
第四章　白银时代　/ 196
第五章　温州农民的伟大创造　/ 208
第六章　对金钱的审判　/ 229
第七章　柳市人找水吃　/ 246
第八章　区长五年　/ 259

下篇　温州试验区——中国试验田里长出参天大树

温州，一直就是在争议声中成长起来的。

温州，一直就是在磨难中发展起来的。

争议来自高层，也来自温州本地。

磨难来自外部，也出于自身。

如果说中央领导希望温州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试验田”的话，理论家们更希望温州首先是自己的实验室。30年过去了，从这块试验田上，果真成长起改革开放的参天大树。

第一章　副总理来了　/ 281
第二章　省委书记在温州　/ 290
第三章　自费改革　/ 303

第四章　姓‘社’还是姓‘资’(上)　/ 317
第五章　姓‘社’还是姓‘资’(下)　/ 332
第六章　激荡着,碰撞着　/ 349

后记　牵一发而动全身　/ 370

序言 PREFACE

为什么是温州？

——《温州试验》序言

陈 林

为什么是温州？我一遍遍地追问。

从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温州是南宋永嘉学派的发祥地（温州古称永嘉）。永嘉学派推崇“事功”，不尚空谈义理心性，在义利之辩中主张“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又注重“通商惠工”。这些思想意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并非主流，甚至有些异类，但亦非空穴来风，想来是与南宋当时、特别是温州一带商品经济的活跃大有关联，有记载说宋代永嘉的商税额有全国平均数的7倍之多。

到了近代，永嘉学派在中西文化交会激荡的背景下迎来复兴。如清末大儒孙诒让不仅学有专精，更身体力行，在家乡温州积极创办新式教育和实业，时与南通的张謇齐名。另一位代表人物陈虬，创办了全国首家采用西式办学制度和方法的新式中医学堂，真正是中西合璧，更提出“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的鲜明主张。这在长期重农抑商的中国可谓振聋发聩的呐喊，发自温州却非偶然，也并不显得突兀。孙诒让、陈虬都培养了很多学生，使清末民初的温州乃至整个东南风气为之一新。

这些源远流长的精神资源，潜移默化，积淀深厚，不仅凝结在文章典籍上，更渗透在日常生活中。在遍布海内外的温州人身上，特别是在本书所介绍的若干位创业者、改革者身上，我们不难发现一些共通的文化禀赋和人格特质潜在其中。正如著名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所指出的：“今天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资源以及绝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不是土地和劳动，而是文化。”

当代温州模式的发端，其来有自乎！

从经济社会环境来看，温州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不便，资源贫乏，特别是地狭人稠，人均不足三分耕地。《宋本方舆胜览》早有记载：“温居涂泥之卤，土薄难植。民勤于力而以力胜，故地不宜桑而织纫工，不宜漆而器用备。”温州人只能在工商业上想办法。由于生存空间的压力，温州先民早有外出经商创业的传统，历代沿袭下来，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早年号称“菜刀、剪刀、皮刀、剃头刀、螺丝刀”，以“五把刀”闯天下。当代人称“四千精神”：“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走遍千山万水”；以及“两板精神”：“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人们惊叹说：“有市场的地方就有温州人，有温州人的地方就有市场。”

亲帮亲，邻帮邻。为了抗衡外部风险，凝聚自身实力，温州人利用了乡土、宗族等现成的社会关系纽带，借以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经济的成功又进一步强化了已有的纽带关系，亦即所谓“社会资本”。温州人“抱团”因此闻名天下。在温州固然有一些大企业，但是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高度密集、充满活力的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彼此之间形成的极具效率的“产业链”往往依托于乡土、宗族关系，从而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快速形成规模优势，又能够灵活应变。

由此可见，乡土、宗族这些曾被视为“传统”的甚至“封建”的东西，经过“创造性的转化”，不仅可以兼容于现代社会，在市场经济中更可发挥独特的作用。事实上不仅在温州，在整个浙江乃至福建、广东的很多地区，都可以发现类似现象，恰恰是这些地方的民营经济容易起步和发展，这是值得经济学者与社会学者、文化学者共同加以研究的。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主人公之一的陈定模先生，晚年归隐家乡后办的一件大事，就是主持修建了陈氏宗祠，我们的作者似乎不必为之嗟叹，传统文化的密码正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基因里面。

众所周知，1949 年以后，农村历经土地改革、统购统销和集体化，城市也很快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乃至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全社会在所有制上推崇“一大二公”，在资源配置方面，商品货币关系则受到极大的抑制。温州也不可能置身于这样的历史洪流之外。不过据有些学者研究，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主义改造”似乎没有北方和内地那么彻底。即便是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酷的政治条件下，还是有一些温州商贩走南闯北，夹缝求生，包括使用“逃荒”、“收破烂”等名义。他们并不显山露水地赚到了钱，也延续了温州一脉尚存的商业精神。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并不像火车扳道岔那么简单，在较长一个时期内，倒像是石头缝里长出绿色丛林，最初可供幼苗生长的空隙是极其狭小的。而温州人特别擅长从小处着眼，不怕不起眼，不怕遭人白眼，从不因“小”而不为，哪怕是一粒纽扣、一枚徽章、一只开关，甚至只是开关上的一个小零件，又或者一个小地摊、一个小饭馆、一个小工厂……

南宋理学大师朱熹曾经对“小”不屑一顾，他挖苦永嘉学派说：“比如泰山之高，它不敢登，见个小土堆子便上去，只是小。”朱熹可能忘了“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的道理。当代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则批评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狭义地强调君子与小人之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统治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当温州民间自求多福，以家庭工厂、产业集群和“小商品、大市场”异军突起的时候，“小商品”多是计划外的小商品，“大市场”更是温州外的大市场，首当其冲的是外部计划经济的秩序和观念在本地所遭遇的直接阻力相对较小。幸而温州本来国有企业不多，计划控制更少，除非受到政治意识形态上的高度压力，否则地方当局不太有足够的利益动机去压制这些市场导向的经济活动。

当然，在整个改革年代，特别是在最初的20世纪80年代，政治意识形态有时是第一位的问题，外部形势更是复杂多变，更不排除地方上的人事纠葛可能掺杂利用了外来的政治压力。温州地方和基层的一些领导干部，则以他们过人的勇气和智慧，有效缓冲和分化了很多政治压力。有的同志还曾经因此遭受委屈和不公正的对待——正如一些书中人物所经历的。

老实言之，与其说温州原有多少体制优势，倒不如说原有体制在温州的空隙比较大，客观上为一些基层的、局部的改革创新留下更多余地，而温州的草根力量也能够适时抓住这样的机会赢得自身的茁壮成长。当这些空隙已经填充殆尽，而大的体制改革还没有突破，则温州势必进入一个相当长的徘徊时期，甚至连那些一度在温州取得成功的改革创新，如果没有在体制上得以正式确立，其在全国也难以推广，其在温州也难以巩固。而

这些年充斥于外界舆论的多是温州“炒房团”、“炒煤团”之类“热点”，有时不乏负面色彩的新闻。除了四处涌动的游资，温州还能为全国贡献些什么？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直到1998年的20年间，温州的GDP增速在浙江省内一直名列前茅。1998年以来，温州本地的经济发展开始明显放缓，到了2007年，GDP增速更是第一次落到了全省11个地市的倒数第一，经济总量长期排名第三（仅次于杭州、宁波）的地位也日益不保，险些要被绍兴超过。虽然单一的GDP指标远不能反映温州经济的全部，但是从纵向上逐年显示的趋势变化，不能不引起人们关注，甚至引发一些焦虑和过度的反应。

一些讨论简单归结为“要素瓶颈制约”，特别是土地短缺，进而开始想当然地“合理”配置要素资源来了。有的同志则想通过“招商引资”之类大干快上的方式“加强投入”。又或者一口咬定产业的“低、小、散”，一旦权力在握，似乎就变得比市场高明起来，不是拔苗助长，就是越俎代庖：一会儿“扶大扶强”，一会儿“扶持中小企业”；一会儿要抓“高科技产业”，一会儿要推“先进制造业”，一会儿又是“现代服务业”；一会儿“调整产业结构”，一会儿“促进自主创新”，一会儿“奖励企业上市”……

凡此种种，言辞固然动听，如果只是口头说说倒也罢了，一旦试图付诸“实施”，又没有制度创新的决心和能力，其所能动用的手段无非是财政倾斜和土地优惠，以长官意志取代市场配置，慷全民之慨，在内外资之间、大小资本之间、不同产业资本之间制造歧视，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隐蔽空间。这些舍本求末、甚至根本就是缘木求鱼的做法，不仅损害经济效益，而且有违社会公平，更与科学发展观背道而驰。

作为中国本土市场经济、特别是草根市场经济的重要策源地，温州已经不能一味陶醉于往日的辉煌，甚至还要防止原有的改革成果被偷梁换柱。温州的市场经济建设，特别是土地、资金等核心要素市场，还没有根本突破。至于公共部门的改革，还没有充分展开。政府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个问题在全国都还没有真正解决。温州的问题，是全国问题的一个先行指针。

近年来，有一些学者不无担心地指出，“改革的共识已经破裂”，“改革的动力已经丧失”。而中央领导同志明确表示，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方

向，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在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实现改革的新突破。

在这样一个承前启后的历史关头，重温一些改革故事，有助于我们获得力量和启示。

如果说温州的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一个缩影，龙港和柳市两镇则是这部改革乐章中不可或缺的音符。陈定模、屠挽生曾是改革风云中的弄潮儿，也是很多历史事件的见证人。尽管有过后来投身商海的经历，但是毫无疑问，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作为是发生于在政府系统任职的那些年。他们不是寻常孜孜求利的商人，更不是那种碌碌无为的官僚，他们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政府官员，有胸怀有眼光，有魄力有手段，因缘际会，成就一方。尽管也有未能尽展抱负的遗憾，是非公道自在人心，他们的功业事迹并不会被忘记。人们多从外部观察温州发展历程所体现的“自发秩序”，但“事在人为”乃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道理，地方精英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一批又一批勇往直前的改革者，改革不会发生，不会持续，更不会成功。

本书以陈定模、屠挽生的口述为主线，既有他们的心路历程和生平事迹，还穿插了许多的故事和人物，上至高官名流，下至贩夫走卒。这种叙事方式也是一个特色，既有宏大场景，也有细节白描，往往使读者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全书语言生动形象，材料翔实可靠，层次分明，结构连贯，一气呵成。

本书作者吴逢旭先生、陈文苞先生一直在关注、研究温州经济，他们不仅是敏锐的记者和职业经理人，也有深沉的历史感和反思意识。根植于温州这方改革创新的热土，他们多年来笔耕不辍。记得2006年5月，吴逢旭先生与朱跃先生合著的纪实报告《中国第一代个体户》就已问世，现在这本《温州试验——两个人的改革开放史》即将出版，堪称姊妹篇，更为改革开放30周年献上了一份厚礼！可喜可贺，欣然为之序。

陈林简介

陈林，1975年生于安徽。现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瑞安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在瑞安任职期间，主持创建全国首家综合性农村合作协

会，领导开展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建设。2006年12月，中共浙江省委、省人民政府在瑞安召开全省现场会予以总结和推广。

陈林是经济学硕士，管理学博士，政治学及社会学博士后，高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以及中共中央编译局从事学习和研究。曾任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审核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中国改革杂志社社长助理。



上篇

陈定模传奇

——龙港走向城市化

陈定模到任龙港镇镇委书记后，开始在龙港这块很小的地盘上，进行土地、户籍等改革，每一项改革都是向当时的政策发出挑战。

陈定模设计的城市日后被命名为“农民城”。

而陈定模在政坛上却是孤独的。

他被人誉为“孤胆英雄”，以至于农民城造好后，他只能黯然神伤地离开了龙港。

一直到 1998 年 9 月，他高票当选为“温州改革开放风云人物”之后，人们才又一次想起了他。他的那些传奇故事始终吸引着我们，也感动着我们。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初出茅庐的陈定模，工作勤勤恳恳，走中间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也安然无恙。

当他作为苍南县委宣传部一名小小的理论科长时，有了机会作“解放思想”的形势报告，他的大胆言论，让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

不可思议的事情仍在继续：在他就任苍南县钱库区区委书记时，他搞起了联产承包，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他制止了宗族间的械斗，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他的体会是：做群众工作，要讲究艺术，讲究策略，讲究方法。

第一章　蓄势待发

1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平阳县山门地区的山民用地瓜度过了饥荒。这给了陈定模以启示：百姓归根结底要吃饱饭，其他都是次要的。

陈定模小学毕业后，在哥哥和妈妈的支持下，考上了平阳中学，可惜，只读了一个学期，家庭便实在无力再供养他就学。陈定模很懂事，就选择退学。不过初中没有毕业的陈定模在当时文化普遍落后的农村，已经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

那年的端午节，19 岁的陈定模第一次离开家乡。他从宜山镇出发，经过 5 个小时的山路颠簸，来到山门区的平阳绿矾厂，成为一名普通工人。后来工厂解散，陈定模回到供销系统，在山门供销社当一名物价员。

陈定模回忆说：山门是平阳县最偏僻的山区，这里头顶的天只有斗笠大。他在山门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当他到单位报到的时候，眼泪几乎都流出来了。

正值三年自然灾害，全国上下粮食减产，平阳县许多平原地区饿死不少人，但是在山门的山区，靠种植地瓜为生，山民们勉强可以度过饥饿的

岁月。

当时，大量的平原地区村民逃到山区，借山民的地瓜丝度日。在山门工作的陈定模把大量的地瓜接济给处于饥饿状态的家乡人。从那时起，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政治运动要搞，但是，老百姓要是没有饭吃，老讲运动，还有意义么？

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陈定模一直在供销社系统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调到平阳县宣传部工作，成为一名机关干部。

2 他对路线斗争十分反感。陈定模初试锋芒：一改平阳医院混乱的局面。医院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

粉碎“四人帮”后，在宣传部工作的陈定模被下派到平阳医院当工作组组长。

这时的陈定模经过工作锻炼和不断自学，已经不是当初站柜台卖书本的销售人员，而是一名具有独立思想、有自己主见的干部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他亲身经历了大量的斗争。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对极左的路线已经产生了怀疑。他想，古代封建帝王尚且主张“爱民如子”，改善百姓的生活，何况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呢？那不是更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现实是，解放后，人民的生活与他们的预期相去甚远。来自农村的陈定模明白百姓的心理。农民是最务实的，不管哪个政党，只要能够给他们带来幸福，改善他们生活，他们就会拥护。

陈定模形成了自己的判断：任何的“运动”，如果是以破坏生产力为代价的，都是有问题的！

不过，怀疑归怀疑，他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因此在动乱的岁月里，他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件事，走中间路线。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不过，他把这些“异端”的想法放在肚子里，等待爆发的那天到来。

当时的平阳县医院经过不间断的斗争、批判，工作几乎处于瘫痪状态。医院里面有 95% 的人员犯“路线错误”，被隔离审查，不断地接受学习教

育。陈定模来到医院后，看到这种场面，非常痛心。“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到医院后采取了三项措施：

一是恢复正常的医疗秩序。他到医院后，马上解散各类“学习班”，让这些“有问题”的医务人员正常上岗，这些人员无不欢天喜地。

二是改变服务态度。每周召开病人代表座谈会，给医生、护士提意见，口碑好的医生给予通报表扬，反之就给予批评。同时，改善医院的卫生条件，要求一天一小扫，三天一大扫，一周一清洗，保持医院的整洁卫生。对这些有“问题”的人员来说，只要不接受批判，不审查，已经是莫大的恩赐了，因此，他们在劳动时积极性非常高。

三是公物归公。在动乱的年月里，医院的管理非常混乱，当时一些医疗器械以及各类医学书籍被一些人私自拿走。陈定模知道，这些知识分子都有自尊心，如果硬性要求他们归还，肯定是行不通。他想出一个办法，首先把内科医生工作做通，叫他们归还书籍。然后陈定模把全体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动员大会。他在会上说：现在医院急需医疗器械和医学书籍，你们当中有人把书拿走，我完全可以理解，你们是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器械和资料免遭破坏，医院非常感谢。现在内科医生已经作出了表率，把保管的书籍和设备器材归还给医院了，希望其他科室的医生也尽快把东西送还。主动送还的，医院将给予表彰，不送还的，到时医院将给予批评。果然，医生们都自觉地把书籍等资料和器械归还医院。许多医生都说，陈定模这一招相当“厉害”，既照顾了这些技术人员的“面子”，又达到收回公物的目的。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由于不搞路线斗争，医院里的人员无不对陈定模十分感激。医院一反过去混乱的局面，医生的精神面貌为之一变。当年，平阳医院就被评为温州市先进单位。

这时，陈定模得到内部消息，他即将被任命为平阳县医院的党委书记。他马上向组织提出：要求回到宣传部工作。

陈定模不想担任医院的党委书记，原因有二：一个是自己对医学是外行，他不想外行领导内行；二是有人对他在医院里搞的一套改革做法非常不满，他们暗地向上级告状，说他只抓生产，不抓路线斗争，立场不坚定，路线不鲜明。陈定模不想授人以把柄，所以他强烈要求回到自己喜欢的宣传部工作。

这是他参加工作以来，第一次主持工作，牛刀小试！

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

3 一个小小的理论科长，凭什么“口出狂言，石破天惊”？凭的是对基层的了解，凭的是政治敏感性，凭的是对改革开放政策的把握。

回到平阳县委宣传部后，陈定模担任了理论科科长。由于他既有基层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加上口才好，做报告生动，所以他还被委任为“县委常委理论辅导员”，经常给常委们上课，把国家最新的理论动态做及时的传达。

陈定模的理论报告会不是单纯的文件和精神传达，而是把自己的思想渗透其中，因此他作的报告往往能发人深省，与众不同。

当时，全国上下已经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许多新思想、新动态在社会上正悄然出现。

作为意识形态的主管部门，陈定模近水楼台先得月。他通过内参等渠道，源源不断地掌握了高层的理论动态，新思想把陈定模的理论思维之“剑”淬得更加犀利。有些新的思想与自己的思考不谋而合，所以他敢于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大胆放言。

1979 年，在一次科局级的干部大会上，他作的报告题目就是《对毛主席评价要一分为二》。他公开在大会上说，要彻底地解放思想，就必须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开题就语惊四座，众人哗然。

接着，陈定模列举了自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反右”开始经过“三面红旗”，大、小“四清”运动，到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事例，来说明毛泽东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的成绩是肯定的，但是错误也存在，因此，对毛泽东的评价，必须要一分为二来看待，并指出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

陈定模最后下结论说：“有人说，对毛泽东不能一分为二来看。我说，毛泽东曾讲世界上的事情都可以一分为二。为什么他本人不能一分为二

看呢？”

陈定模报告会结束后，会场顿时砸锅了。毕竟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长期在“左”的路线熏陶下，官员的思想观念不可能转变得那么快。加上国家的政治形势还不太明朗，即使有改革思想的官员，也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表态。

陈定模大胆而充满着许多“异端”的思想令许多官员和领导也感到不可思议！

县委副书记李长茂好心地把陈定模拉到一边说：“小陈啊，你知道吗？你的言论在过去是要被拉出去批斗的。你怎么管不住自己这张嘴呢？小心出事啊！”

陈定模却沉着地说：“我讲的这些内容，是我临时决定，有感而发的。请领导放心，今天的报告会，如果上级要处理，责任全部在我，与领导绝无关联。有问题，我陈定模独自承担。”

此后，陈定模依然没有把领导的忠告放在心上。一年之中，在全县作了43场报告，每场报告都有新思想、新见解。有时讲到激动处，他甚至拍案而起。从此，他得了“铁嘴”的绰号。

据他回忆，他当时的勇气和底气来自深厚的理论功底，敏锐地察觉到政治风向的变化，还有就是来自对底层群众的了解与同情。

4 “腾蛟经验”初步实践了陈定模脑海中的一些创新思想。他所搞的那一套，与后来的“包产到户”或“联产承包责任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1979年，陈定模被组织派往平阳县腾蛟区担任工作组组长，在走马上任前，县委特意向他交代，此次工作主要任务有两条：一是坚决刹住“单干风”；二是把当年的冬种生产抓上去。

腾蛟区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苏步青和“百岁棋王”谢侠逊的老家。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但是在当时，腾蛟区农民的生活却异常贫困。

陈定模带领的工作组进入腾蛟区后，不像别的工作组那样不停地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